

“隔代养育”的观察报告

华明玥



《大米小兰：带娃亲历记》
莫小米 著
上海远东出版社

婚恋专家在最近十年的调查结论是，25岁到35岁的年轻人生了孩子，有高达85%的人要假手祖辈帮忙，而外婆带娃的比例，在大中城市又高于奶奶。无论外婆年轻时是家庭主妇还是各领域的专家，因为心疼女儿而放弃自己退休后的悠闲生活，而成为“全职外婆”的人不在少数。报刊散文界鼎鼎有名的莫小米老师也不例外，2015年，她的女儿章依萍放弃在全世界玩潜水的计划，生了女儿，从这一天起，莫老师开始成为全职外婆。

2024年春夏之交，我收到了莫老师的新作《大米小兰》，这部散文集是她近距离观察外孙女蔡米兰成长的收获。通读此书，让我意识到莫老师从前一人分饰两角，又当编辑又当作家的绝活，多年后依旧炉火纯青——她从来不会沉溺在与孙辈相处的天伦之乐中不能自拔，相反，多年的记者生涯总是能让她不时跳脱祖孙之间的情感羁绊，以第三视角客观地记录与分析，孩子从一个婴儿，成长为精灵古怪的三年级小学生的全过程。

很显然，这一过程既充满了惊喜与温柔，又充满了困惑与自我否定。于是，与其他人记录孙辈成长的散文常常不由自主地美化天伦之乐，美化成长的甜蜜，不由自主地写成“甜宠文”不同，莫老师犀利的观察和缜密的逻辑思维在这部散文中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内核——那就是忠实地记录养育者甜蜜的烦恼，隐秘的内心拉扯，以及需要按捺的焦虑、暴躁、忐忑乃至愧疚，以及如何做自我建设，重获养育者的自信与从容。她写作这本书，无意中为如今一二线城市中不可避免的“隔代养育”，提供了一个显微镜级的标本：它照见祖孙携手成长的酸甜苦辣，每一个细胞核都清清楚楚，而非一撮歌颂亲情的甜腻白糖。

阅读这本书，你很难不为莫老师认真细致的观察，天马行空的思

考，以及蹲下来、与孩子形成共情的能力所折服。

在外婆眼中，孩童是天生的诗人：孩子一岁多，第一次看到腰果，她就形容说“小袜袜”。看见喷泉，她说“看，蝴蝶”。那确实是光影和水流共同塑造的蝴蝶，蹁跹欲飞，轻盈闪烁；孔雀开屏发出沙沙的响声，她形容说“下雨了”。工作时的洗衣机，她形容说“快看，芭蕾舞！”那确实是水流的芭蕾舞，踮脚，不知疲倦地旋转。此时此刻，宝宝们就像身在都市心在四野的旅行者，他们在意识的池塘中自在地戏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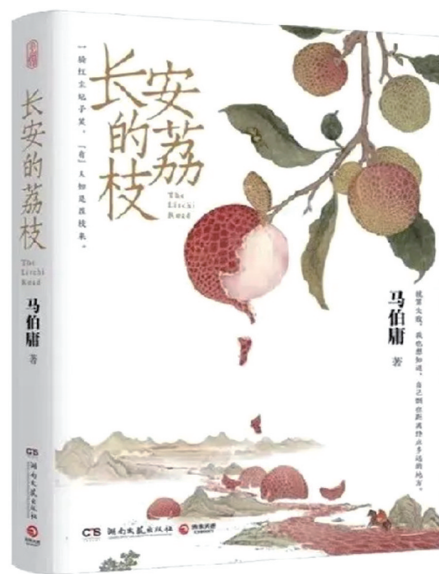
他们反衬出成人的狭隘与无聊。从这意义上说，养育，是又过了一遍童年。

成长有其特有的加速度，一天，蔡米兰突然够到了大衣橱的拉手，将门拉开，发现她三岁之前玩过的所有毛绒玩具都被静静地收在这里，占了大衣橱的满满一格。在那个探险的晚上，米兰带着哭腔说，“原来你们都被关在这里。好可怜啊！”看到这里，所有的读者都会愣神，会被孩子发自内心的善良所打动——米兰也成为一个小时候的大儿童了。她渐渐长高，全家人创造了一些“够着了”的游戏让她玩。外婆将四个冰箱贴一列竖排，让米兰从低到高依次地摘取。她踮起脚，伸手就摘下了最高处的一个，开心大笑。够不着和够着了，可以囊括人生的基本状态。当然，够着了，也会有危险。莫老师拓开一笔，发人深省地评论道：“况且，终究有够不着的那一天。”她默默期待：在外孙女长大成人之后，够不着某些目标的时候，也能泰然处之。

这本书会让你明白，在目前这种内卷的养育环境下，养育者要保持“顺其自然”的平静，“安之若素”的自恰有多难。虽然，做多少心理建设，也有可能遇到力不能及的崩溃时刻，虽然，小人儿一旦有了独立意识，养育者的权威也会遭到一而再再而三的挑战，但这所有的惘然若失之感，都不会抵消近距离看到成长势头的安慰：莫老师的外孙女，从睡得“像一个陀螺”的婴孩，到不停地要求出门看世界的倔强娃娃，再到一个能在香格里拉画唐卡，并吐槽外婆“情绪管理很差”的小学生，她目前学会了邀功：“要不是我（在散步路上）反应快，经常拽开外婆，外婆已经被电瓶车撞了快100次。”这种从引领者、保护者而变成被引领者、被保护者的隐秘快慰，非亲历者也是很难体会的吧。

唐代社会的权力结构与个体命运

沈慧君



《长安的荔枝》
马伯庸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杜牧的这句诗，描绘了一幅动人的历史画面，同时还蕴含了深刻的历史批判。在马伯庸的《长安的荔枝》中，这一历史画面被赋予了新的文学生命。小说以杨贵妃对荔枝的偏爱为背景，描写了一个芝麻小官李善德如何完成几乎不可能的任务——将新鲜荔枝从岭南运送至长安的故事。荔枝是甜的，《长安的荔枝》却是苦的，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任务，却揭示了唐代社会的权力结构和官僚体制。小说中对保鲜手段、运送途径、运送成本的考量，不仅体现了作者对历史细节的严谨态度，也反映了他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深刻洞察，并在这一过程中，李善德的形象逐渐丰满起来。

马伯庸的《长安的荔枝》不仅仅是对杜牧诗句的文学再现，更是对历史与权力结构的深度挖掘和批判。在小说中，马伯庸选择了一个小人物——李善德的视角来展开叙述。这种微观的视角使得历史不再是宏大叙事的堆砌，而是充满了个体情感和生活细节。通过李善德的故事，我们能够看到唐代社会中那些被边缘化、被忽视的小人物的生活状态和内心世界。小说中的荔枝运送任务，不仅是一个历史事件的叙述，也是对唐代社会现实的隐喻和批判：唐玄宗和杨贵妃为了满足口腹之欲，大肆劳民伤财；官僚机构之间层层剥削，对底层人民不断压迫。同时，这本小说中出现的各种文献记载和历史典故，还展现了文本之间的互文关系，使得历史与文学相互映照，一起构成了对过去的理解。

不难看出《长安的荔枝》是对历史的一次文本性重构，马伯庸通过小说这一文学形式，重新编织了唐代的历史画面，赋予了历史新的生命力和意义。同时，小说中对历史细节的严谨态度，如在文中提到的杜甫，他在唐朝官场里也同样处于底层，所以能与李善德产生共鸣，当他在文章中出现，并鼓励了李善德，这一情节并不会让人们怀疑其合理性，只会让人想到，在那个真实的历史上，杜甫是不是也会这样帮助、鼓舞别人。这一情节恰恰体现了文本所具有的历史性，即文学作品也是历史的产物，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状况和文化特征。

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下，个体在历史洪流中的位置和选择显得尤为复杂且关键。李善德在面对高官的威逼利诱时，作何选择，与故事的情节紧密相连，通过他的选择和抗争，小说展现了个体在面对巨大历史压力时的无奈与挣扎，以及对个人价值和社会责任的深刻思考，所以在文章的最后，李善德被贬去岭南，如同在命运的安排下无意逃离了爆发安史之

乱的长安，并在最后过上了相对稳定幸福的生活，这是马伯庸对他的安排，也是对其前期选择的一种回应和总结。

《长安的荔枝》巧妙地利用荔枝运送这一事件作为切入点，揭示了唐代社会的权力结构和官僚体制的复杂性矛盾。小说中，李善德这个角色的设定本身就是对官僚体系的一种讽刺。作为一个小官，他本应是官僚斗争中微不足道的一笔，却意外地被卷入了一场关乎皇权与贵族欲望的争斗之中。在执行荔枝运送的任务过程中，他遭遇的各种障碍和权力的压迫，生动地展现了官场的暗流涌动和权力斗争的残酷。每一次的挫折和阻碍，都是对那个时代权力滥用和社会不公的深刻批判。在小说中，李善德在尝试解决荔枝保鲜的问题时，不得不面对官场中层层叠叠的审批流程和各级官员的故意刁难。这些细节描写不仅体现了作者对历史背景的深入挖掘，更是对当时社会现实的隐喻，反映了官僚体制内部的低效和腐败。而当李善德终于找到了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时，他却发现自己的努力可能会被更高层的权力所利用，这种无奈和挣扎，不仅凸显了个体在权力面前的渺小，也是对那个时代社会不公的深刻揭露。

总之，《长安的荔枝》不仅是对一个历史事件的艺术再现，更是对历史、权力、社会和个体的深刻反思。马伯庸通过对一个小人物命运的关注，展现了历史的复杂性和多维性，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重新审视历史和现实的视角。

